

从小时候记事起,我家烧饭取暖,一直用煤球炉。冬天搬进屋里,其他时间,放在屋外的廊檐下。那时候,已经有了烧蜂窝煤的炉子,院子里很多街坊选择了这种炉子,因为用蜂窝煤方便,有专门生火用的炭煤;也比煤球冒烟少,干净些。但我家不用,我爸我妈都说蜂窝煤比煤球贵,也不如煤球经烧,冬天还不如烧煤球暖和。

我心里清楚,贵是最主要的原因。另外一点,蜂窝煤必须机制,煤球可以自己打。那时候,大家都管自己做煤球叫作打煤球。打煤球,用煤灰掺上黄土,浇上水,合成泥,像摊煎饼一样,摊在地上,使劲儿拍打,把煤饼拍平,然后用铁铲在上面划成一道道的小方格,就像我在空白纸上用尺子打成一个一个小方格,好在方格里面写字一样。煤饼晒干后,一个个的小方格分开了,就成了煤球。从煤铺买来的煤球,在磕碰中,会掉下煤灰,煤灰积攒多了,成了煤球的主要原料,废物利用,自然比买煤球省钱。有时候,我爸也会从煤铺里专门买煤灰和煤渣,就像那时候点心铺里卖点心渣一样,这就更便宜了。

打煤球这活儿,主要是我妈干,有时我和弟弟也帮忙。不过,我妈总说我们添乱,不是黄土掺多了,就是水浇多了,要不就是打格时打的大小不一。我不知道,在我家的煤球炉里,用自己打的煤球多,还是买的煤球多。我知道冬天把煤球炉搬进屋里,是我爸大显身手的时候。他要先在窗户纸上挖一个洞,在外面安上一个风斗。这个风斗,是他自制的。用林秸秆做成上宽下窄的一个梯形的架子,再用高粱纸糊在架子上,上面的宽处露出来,可以通风。然后,把买来的几节白色洋铁皮做的烟囱,一头安装在煤球炉上,一头捅出窗外,拐弯的地方,要安上拐脖儿,也是用洋铁皮做的,衔接两节烟囱。风斗就安装在烟囱出口的地方,主要为屋内通风,防止煤气中毒。糊风斗的高粱纸,是我爸专门在前门大街的公兴买的,那是家老纸店铺。这张糊在风斗上的纸,要在外面经受一整个冬天的风吹雪打,得结实点儿才行。有人家用旧报纸糊风斗,我爸说这钱省不得,报纸脆,没有高粱纸绵、有

冬天的煤球炉

肖复兴

韧性,风一大,就给吹破了。冬天天黑得早,吃过晚饭,我妈早早就把火封上了,等第二天早晨起来,再把火捅开,为的是省点儿煤球。煤球炉子的炉膛比蜂窝煤炉小,炉膛比蜂窝煤炉大。炉子中央坐一钢精壶热水,炉盘四周烤几片窝头片,我写作业饿了,可以填填肚子。橘子便宜的时候,买一些橘子,剥下来的橘子皮,也会放在炉盘上,橘子皮的清香和窝头片的焦香,一起在小屋里飘散,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最美的味道。如果是下雪的夜晚,白雪红炉,温暖又温馨的气息,在小屋里弥散。我一般复习功课到夜深,我爸我妈和弟弟都睡下了,小屋很静,雪花扑打着窗户纸,烟囱、风斗的飒飒声和煤球炉上钢精壶嘴冒出的嘶嘶声,还有我爸轻轻的鼾声,此起彼伏,相互呼应着,是最难忘的小夜曲了。

1974年春节刚刚过后,我从北大荒正式调回到北京当中学老师。我爸已经去世。初春天气,春寒料峭,我迈进家门,不知怎么一眼看见了屋子中间的煤球炉,这个从童年就看惯的煤球炉,那一天格外扎眼。用了二十来年,它已经破旧不堪,炉壁和炉盘都烧薄了,炉盘破了好几处,炉口也变形了,炉盖根本盖不严实炉眼儿,隐隐的火苗,使劲舔着炉眼儿,想要跳出来,红得有些刺眼。

这样容易煤气中毒呀!我忍不住想这样对我妈说,但到嗓子眼儿的话,又咽了下去。去北大荒六年,中间回家探亲好几次,其中也曾经有一次是冬天回来过,怎么就一次没有注意煤球炉呢?怎么就觉得它和父母一样真的可以长生不老呢?我的心,针扎一样,一下子很痛。

第二天一早起床后,我对我妈说:妈,咱们买个新炉子去吧!我妈听了先是有些惊奇,但立刻很高兴。那时候,买炉子需要证明,我妈忙到街道办事处开了证明,跑回家,叫上我一起去买炉子。我记得那样清楚,是出老街东口、到花市大街买的一个蜂窝煤炉。我和我妈一人一边,抬着这个沉甸甸的蜂窝煤炉,走向老街,就这么一直抬着,迎着料峭的风,走回家。半路上,也没有歇一歇。那一年,我妈快七十岁了。

父亲俞汝捷在浙美社出了本新书:《老辈风流》。装帧颇雅致,而令我感兴趣的是,书里书外,涉及的多个个人物都为我所熟悉,所叙往事也能触发我的回忆。

书里谈得最多的三位老人,第一位瞿蜕园先生,父亲称他“蛻老”。我没有见过他,但我在安福路住过多年,经常路过武康路巴金寓所对面的瞿宅旧址,也知道该宅曾有一株玉兰被屋主和友人动情吟唱。我还见过蛻老与我祖父母同游桂林公园时的合影,那是目前仅见的蛻老晚年的生活照。令我好奇的是,一个辞世逾50年的老人,没有什么宣传,其遗著却一本接一本被不同的出版社重编再版,这次《老辈风流》的书名又集自他的手迹,封面背景亦采用他会赠陈寅恪的《藤花图》



河界

齐铁偕 诗书画

书里书外

俞知宁

(据说该图曾长期悬挂于陈氏书房),这只能说是著作和书画自身的魅力吸引了编者和读者。

第二位姚雪垠先生是我见过很多次的长者。40多年前父亲任姚老助手,我曾有两年随住北京,并在东城区一所小学借读。每周六下午,我们都会去木樨地姚家。姚老和父亲在客厅聊天,我和姚老的孙女小樱、小桦在另间房玩耍。我不关心大人之间的谈话,但我能感觉到,每次见面,姚老都很开心。他们之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题,常常大家都已上了餐桌,他俩还聊得起劲。现在读了书中“闲聊种种”一节,才知道他们交谈的内容很杂,从历史到现实,文坛到政坛,海阔天空。姚老夫妇很好客。我们每

次去姚家,必定晚饭后才离开。而每逢有客人来访,但凡接近吃饭时间,也总是被热情的主人留下共餐。我那时太小,对来客为谁从未留意,现在依稀记得的是,除文学界人士外,导演梁信、尤小刚等都曾到访并一起吃饭。作曲家刘炽亦曾来访,饭后闲谈中被问及那首著名的《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他模仿了郭兰英的一些独特唱法,说后来的演唱者都唱不出那个味道。

第三位程十发先生是国画领域“程家样”的创造者。我知道父亲曾为9册《程十发书画》作序,知道他们之间的友谊,但很长时间我并没见过程老。直到2002年,寓居武汉的父亲让我代他去程宅探望,我才首次见到这位一口松江方言的老画家。之前我听说程老作为画院院长曾通过作画、卖画为职工解决住房问题,又将自己珍藏多年的百余件元明清字画捐赠给国家,不由得对他充满尊敬。但程老绝口不提这些事,只是风趣地说些笑话,又取出一本不久前重版的连环画《胆剑篇》,落款后让我带交父亲。

《老辈风流》的不少内容与收藏相关。我父母的祖辈都是从清末民初走来的书宦人家,雅好收藏。所收藏品经过十年浩劫,大都杳如黄鹤,却也有一些文物因种种机缘得以存世,其中若干遂已捐赠相关藏品。这里,我想提一下母亲的外祖范熙王,一是因为我见过一张他与孙中山的重要合影,二是因为多件捐出的藏

品都与他相关。

那是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应邀北上,在天津张园与欢迎人士合影。这是他生前最后一帧立于众人之中的照片,而与中山先生并肩居中而立、位置显然最为重要的戴眼镜人士,就是范熙王,时任国会非常会议主席,系专程从北京赶来迎候。三个多月后孙中山病逝,范熙王又代表国会起草了《祭前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文》。

关于范氏其人其事,已分别有人写过传记和博士论文,其铜像也已矗立在黄陂长乐园孙中山塑像之侧。铜像下方的文字简要叙述了他从早岁就读两湖书院到中年经李大钊介绍秘密加入中共的一生,称他为“近代追求中国复兴之梦的先驱之一”。他曾于1902年以初试、复试均获第一的成绩考入京师大学堂,又曾于1906年创办近代中国第一份翻译杂志《新译界》,而当年的试卷原件和《新译界》创刊号都已捐赠北大校史馆,成为记载校史的重要藏品。以他为主要作者的《两湖书院课卷遗存》共19卷21册则已捐给华中师大博物馆,即将影印出版。他生前收藏的两部明版书(《朱文公文校昌黎先生集》《周易经传》)早在2015年4月23日捐赠给湖北省图书馆,他和他父亲范轼的5函诗文手迹也于同年5月18日捐赠给湖北省博物馆。二馆都举行了捐赠仪式。凡此在书中都有生动的叙述。

马未都为《老辈风流》写的推荐语:“有一种天然的魅力,不矫揉造作,真实自然地记录了生活,记录了感情,继而记录了时代。个人的片段放在历史的画卷中,让历史生动圆融,真实有力。”40多年前,父亲在中青社的办公室与《青年文学》编辑部相邻,我与该刊编辑混得很熟。当看到上述推荐语,我眼前就浮现出了马未都当年落拓不羁的样子。



刀光见影

云想霓裳

他是我最喜欢的西方小说家,他是最讨厌的西方小说家;他的文字击穿过我的幼稚,他的文字激发了我的成长;对他的作品,我曾有蒙昧时的不甘和恨意,对他的作品,我亦有见识后的赞叹和感恩;作为一个女人,我深知他对女性的一些洞察所言非虚,作为一个女人,我又绝不能宽宥他那些所言非虚。这是阅读的喜悅,也是思想的折磨。

他就是毛姆。甚至我的精神世界里,都默契地潜伏着对毛姆的爱恨情仇。他像一道光,照亮了我们;他又像一把刀,剖开了我们。在这衰艳的刀光里,我们纷纷俯下身去用文字拾获了属于自己的那片影子。

十月的伦敦惯会阴晴不定,先是假装体面,云朵堆得像绸缎,阳光温柔得像刚刚爱上的情人。下一秒却能翻脸,天色瞬间阴霾,风卷着街边的黄叶没心没肺地翻滚。我从国家美术馆闲逛到梅菲尔,一幢又一幢的褐砖宅邸像一页页历史的侧影,齐整、端正,从骨子里透出骄矜。我并不是去寻他的,更不知道原来他在这里……是不经意瞥见的一处蓝色牌匾上写着:“W. Somerset Maugham lived here 1874—1965。”我愣神在原地,像被往事奇袭了那般笃钝了几秒钟,旋即发自内心的想笑。这毫无防备的照面,颇有他小说中宿命的味道,像极了“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那些在他的文字里遭受过的羞辱和修炼到的彻悟无差别地在回忆里铺陈开来,曾经的我,既佩服得五体投地,又怨憎得千刀万剐。

如果文学境界真存在某种“报应”,我想就在这里偿还。于是,在他的故居前,我用中文对他说:“你丫的再会讲故事又如何呢?你的人生故事里,连一个倾心的女人都未曾遇见。俗世人不肯相信自己不曾拥有的东西,你也不能免俗。你用冰冷的欲望浇灭炙热的情焰,你看穿所有,却没能躲过自己的刀锋。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浅薄、虚荣、头脑空空,对你,我亦有深深的惋惜,尽管我知道你毫不在意,甚至会嗤之以鼻。”

被毛姆煎熬过走出了讽刺的女性们,总想以不甘心的执拗活出自己的游刃有余,这不仅仅是通透,更是勇敢——敢恨、敢爱、敢离开。他的文字始终是一盏明灯,又宛如情人般的存在——木心说:“切齿痛恨,而又切肤痛惜的,才是情人。”

对淮北的乡村最深刻的音响记忆,是一种从土地深处生长出来的,带着些许悲凉,却又无比优美的腔调——泗州戏。当地的乡亲们,给了它一个更直击魂魄的名字:拉魂腔。

“拉魂腔”的伴奏极简,一把土琵琶,一把二胡,一副梆子,便是全部了。可就是这几样简单的乐器,却能托起那撕心裂肺般的悠长唱腔。那声从喉咙深处迸发出来,带着原始的苍凉,在夜空中盘旋而上,凄厉,绵长,却又在转折处透出清丽的底子。它不追求圆润,反而有一种粗粝的真实,像淮北平原上冬日

拉魂腔

许桂林

的风,直往人的骨头缝里钻,听得人肝肠寸断,却又觉着一种宣泄的快意。戏散了,那调子却仿佛还缠绕在汽灯周围的光晕里,三日不绝。

泗州戏是与黄梅戏、庐剧、徽剧并列为安徽四大剧种,已有两百余年波澜壮阔的传承。在淮北,“拉魂腔”是长在百姓喉咙里的,随意寻一人,都能给你来上那么一段。它与

江苏柳琴戏、鲁南淮海戏同源而异流,自成南派一宗。

如今的泗州戏,依然被淮北大地的人们称为“拉魂腔”,但却少了许多旧时的凄凉与悲切。虽然生活的喜怒哀乐,人间的酸甜苦辣,依旧鲜活地跃动在其旋律之中,只是那底色,已悄然换上了更多的甜美、欢快与豪放。那腔调,拉的已不单是悲情之魂,更是生活之魂,是这片土地上人们生生不息的坚韧与乐观之魂。它从苦难中生长,最终却超越了苦难,成了淮北风骨最深沉、最动人的拉魂吟唱。

由新民晚报社、虹口区委宣传部携手发起的“夜光杯·左翼·青年写作计划”旨在以文学团结青年,彰显文字的力量。两年来,为青年写作者搭建了一个思想碰撞、实践淬炼与才华展示的平台。第二季围绕“左翼文化与当代青年责任”,鼓励青年用最适合的方式表达思考。通过学子们炙热真诚的文字,我们期待左翼文化精神在当下焕发新的生命力。

——编者

90年前,左联作家以“揭出痛苦,引起疗救”为志,把笔尖对准码头工人、缙丝女工、街头流浪儿。左翼文学教会我的第一门功课,是把个人的小悲欢放进社会的大结构,让“我”与“他们”连成“我们”。

时间被左翼前辈的脚步印折叠,我愿意在这折叠处,向百年前的同龄人报到。

而今我们不再写“包身工”,可当我、当我们书写工人苦难的同时,是否消费着他们的痛感?

当我、当我们批评平台资本的同时,是否也在享受次日达的便利?《多余的话》里写道:“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却因此更看清了自己的暗影。”左翼不是道德高地,而是自我拷问:一个问题逼我们把“批判”先对准自己,把“责任”落在日日自新的躬身实践。唯有如此,我们才不会把左翼简化为怀旧符号,而让它成为持续校准生命方向的坐标。

我们在百年的建筑里望过去一眼,对着鲁迅先生的木刻画像,仿佛听到那句:“青年又何须寻那些金字招牌的文学?”那些让我们侃侃而谈的文学从来都不属于博物馆,它活在每一次我们敢于“不那么聪明”的相信、敢于“不那么安全”的发声、敢于“不那么舒适”的行动

里。很多人落笔,于是文学先成为“手边的火把”,再成为“远方的灯塔”。所以文字永驻,文学永恒。我们都是普通通的人,我们的爱好也很“大众化”。文字文学不是高悬于殿堂的遥不可及,它理应在承担起一群人的喜爱之后负担起更沉重的责任。

当我们敦促自己赶紧把灵感落在纸上时,不要忘了让灵感回到它最初的诞生地,回到市井长街、烟火人间。文字文学永远温暖,文字文学永远有力量。愿我们带着此刻的夜光,把刚刚写下的语句折成纸船,放进时代的暗流——哪怕只能照亮一方水面,也足以证明:文学仍在,青年仍在。

生命里的雨季占比太大,可我们提起青春的时候远不止青

苔。青年的骄阳永远盛放,我们向往山高水长、热烈奔放,想在这看似为数不多的生命“绝唱”里真诚地互诉衷肠:“是海洋,不是泥潭”。然岁月的诗集永不泛黄,每一个“当下”赋予永恒,少年的诗篇与时间共长。

从风里截取勇气,在心底种下热忱,踏过荆棘时,让伤痕绽成带刺的花;渡过人海时,让浪潮推我向远方;攀越山峦时,把云雾踩成向上的阶梯。所谓“青年责任”,不过是无数“我”在寻找“我们”时,那一点不肯熄灭的微光。

此去,愿我能抖落旧年的迷茫,以崭新的目光看这人间。看阳光穿透云层,在大地上写诗,让我,我的生命、我们的文字,奔流去向那人世间。

十日谈

夜光杯·左联·青年写作计划 讲习所门
听,青春在发声 前再度集
责编:吴南瑶 合,出发。

木刻